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

左芙蓉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 北京 海淀区 100083)

[摘要]13世纪初,罗马天主教就开始与蒙古接触,罗马教皇曾派方济各会会士面见蒙古大汗,劝其停止征战;率领十字军东征的法王路易九世也曾让另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前往蒙古军队送信,以联合对付伊斯兰教国家,但都未成功。蒙古入主中原并建立元朝以后,却又主动要求罗马教皇派遣天主教士来华,于是天主教正式传入中国并且得到传播和发展。这一变化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关键词]罗马;天主教;蒙元;关系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7)03-0046-05

欧洲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既是元代对外关系的一个方面,也是天主教在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最初,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出于自身利益曾主动与蒙古统治者联络,但都未得到积极回应。蒙古人主中原之后,元代统治者却一改以前的态度,主动要求罗马天主教遣人来华。本文通过对这一变化及其原因的分析,展现欧洲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以及天主教在华的早期传播。

一、天主教与蒙元的初期接触

蒙古西征期间,罗马教皇曾主动与之联系,但得到的回应却令他失望。13世纪初期,蒙古的西征曾经使欧洲的统治者们惶恐不安和万分忧虑。1245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在里昂召开公议会,商讨如何对付蒙古的威胁。方济各会会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o di Carpine)被教皇派往中国,面见蒙古大汗,劝谕其勿攻打基督教民。1245年4月16日,柏朗嘉宾怀揣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书信离开里昂,信中希望大汗通过来访的修士告知西征的原因和意图。与柏朗嘉宾同行的

还有一位修士。他们在伏尔加河畔见到蒙古统帅拔都,表明此行的目的为:“教宗派遣我们来见贵国皇帝、贵国皇太子和所有鞑靼贵人,教宗只有一个目的,他希望基督徒和鞑靼人做朋友,希望大家和平相处。他更希望鞑靼人能 and 天主同在天堂享受荣福。因此,他写了信,还派遣我们来劝他们奉教,接受吾主耶稣基督的信仰,因为他们如不这样,就无法得救。”^{[1](P.44)}这封信表达了反对蒙古西征和劝蒙古人信仰基督教两个意图。柏朗嘉宾等人在拔都的引见下在和林觐见了贵由大汗。大汗的答复是:“你教宗和王公巨卿,如诚心和我修好,便当速来见我,不可迟延。你来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应该受洗。你来书,又因我们杀人之多,而觉得惊奇,尤其因为信基督的波兰人、匈牙利人、奥拉维人,而感不安,我亦不明白你惊奇的原因。我告诉你:他们不听上天和成吉思汗的命,杀戮我们所派的使臣,上天所以借我们的手来杀灭他们。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但……我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我将自东徂西,征服世界。”^{[2](P.14)}显然,教皇的劝谕未能奏效。主要原因是,此时蒙古的征服战争如日中天,

* 本文为2006~2007年北京学基地课题“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档案资料编译”的部分成果。

[收稿日期]2006-08-30

[作者简介]左芙蓉,女,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哲学博士,副教授。

所向无敌,不可能因为教皇的一纸书信而停止。而且,在大汗看来,教主没有亲自前来,表明他并无诚意。此外,蒙古统治者对罗马天主教毫无所知,拒绝接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双方却因此互有了一定的了解。

后来,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在十字军东征途中听说蒙古大军在顿河区的统帅撒里塔是一个基督徒,有意与之合作,以共同对付伊斯兰教徒。于是,路易九世让另一位圣方济各会会士罗伯鲁(Guillaume de Rubrouck)以传教士的身分前往蒙古军队送信。罗伯鲁到达之后,发现撒里塔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很失望,但是他并不甘心,乃继续东行到达和林,见到了蒙哥大汗。蒙哥认为,十字军的东征是与他西征的对抗,双方不可能谈论合作,惟有对方臣服。因此,他让罗伯鲁带回一封致法王的信,信中写道:“我们现在把永恒上帝的书写的命令送给你:如果你们自以为关山阻隔,而违抗这命令的话,永恒上天知道我们将怎样对付你们。”大汗拒绝与法王合作,使罗伯鲁有辱使命,但罗伯鲁此行也并非全然没有收获,他对蒙古的状况和东西交通的道路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返回之后所写的报告激起了欧洲对东方的兴趣。

西征结束之后,蒙元统治者对天主教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前的藐视和完全拒绝到欢迎和优遇有加。

蒙古西征掳回一些战俘和工匠,其中就有很多是西亚、东欧的天主教徒(主要是景教徒^①),天主教因此传入蒙古。13世纪后期,蒙古入主中原,天主教进入蒙元中国。元朝统治者在宗教方面实行兼容政策,包括天主教在内的一些宗教得到自由传播和发展。

1266年,意大利商人尼哥罗(Nicholo)和马菲奥(Maffeo)两兄弟来到元代的统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当他们西返时,皇帝令其携书信而回。信中要求教皇派遣100名熟知基督教律且通晓7种艺术(即文法、伦理学、修辞学、算数、几何学、音乐、天文学)的人来华。这些人“须知辩论,并用推论,对于偶像教徒及其他共语之人,明白证明基督教为最优之教,他教皆为伪教”。忽必烈还表示:“如能证明此事,他同其所属臣民,将为基督教徒,并为教会之臣仆。”^{[3](P.13)}

尼哥罗和马菲奥于1269年回到欧洲,向教廷呈递了蒙古的国书。两年之后,尼哥罗、马菲奥与

尼哥罗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陪同教皇派遣的两位宣教士尼古勒(Nicole de Vincence)和吉岳木(Guillaume de Tripoli)前往中国。两位宣教士在半途因惧怕危险而折回。尼哥罗等3人又经过长途跋涉,于1275年夏到达上都复命。

马可波罗在元朝留居17年,颇得忽必烈信任。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诸地,还在扬州做官3年。1291年,忽必烈应伊利汗国的请求,将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的使臣护送公主,由海道西行,1292年左右抵达伊利汗国,完成了护送任务。然后马可波罗继续西行,1295年返抵威尼斯。根据他口述整理的《马可波罗行纪》,记载了他在旅途和居留元朝期间的见闻,也使罗马教廷得知,中国已有大批的基督徒。

中国景教徒列边·扫马的欧洲之行则促使罗马教廷派遣传教士东来中国。

扫马约于1225年出生在北京的畏吾儿或汪古部的一个景教徒家庭,后来自愿做了一名隐修教士。因景教长老被称为“列边”,所以,扫马又被称为列边·扫马。至元十五年(1278年),扫马与另一位名叫马可(Marc)的景教徒奉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行至巴格达时因战争稽留在伊利汗国境内。1280年,马可被任命为契丹与汪古的大主教,更名为马可·亚伯刺罕(Marc Jabalaha)。1281年,巴格达的景教总主教去世,马可·亚伯刺罕被推举为总主教。

1286年,扫马以伊利汗国阿鲁浑汗国王和马可·亚伯刺罕总主教的名义赴罗马。此时正值旧教皇死,新教皇未立,扫马受到了教廷枢机们的长时间盘问。他介绍了基督教在东方的大致情况以及他此行的目的:“我们的许多神父过去都曾到过蒙古人、突厥人和汉人的地区,并且向他们传授教义。今天,许多蒙古人都成了基督徒,有些王公和王后都领洗并向基督告解。他们于驻牧地设有教堂……教皇没有派遣任何人到我们这些东方人中

^①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创始人聂斯托里,因此又名聂斯托里教。景教教派的大主教因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的双种属性,被正统排斥为异端,处以死刑,他的信徒逃亡东方。景教于公元6世纪左右传入中国。景教在唐朝一度兴盛,后遭迫害,景教徒开始向西迁徙。当时西域对宗教信仰很宽容,随即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11世纪,游牧于蒙古北部的蒙古族克烈部皈依了景教,由于成吉思汗娶了克烈部的一位王女,景教亦随之传入成吉思汗家中。此外,马可波罗曾提到以蒙古东部及满洲部分地区为领地的乃颜部,其乃颜和不少部属都是景教教徒。

来。这都是一些布道圣师向我们传授的,我们今天仍相信他们传授给我们的一切……我自遥远的地方而来,并非是为了谈论或宣扬我的信仰,而是为了表达我对主教皇的崇拜,为了瞻仰圣师们的圣物并通报国王和天主教大主教的启示。”扫马的解释使教廷枢机们对东方基督教有了印象。

由于扫马此行还负有其他使命,于是他又前往法、英两国。在法兰西,他受到国王菲立蒲四世(Philip IV)的接见,得到法王支持阿拉伯人夺取耶路撒冷的允诺。他还参观了巴黎的大学,发现“那里有3万多名知识分子,研究宗教和世俗科学……他们以书写而度时光,受到国王的支持”。在参观圣丹尼(Saint Denis)大教堂时,扫马注意到教堂中的王陵供奉有镀金镶银的国王卧像,“在为这些国王的灵魂服务中,共有500名修士由国王出资供应饮食,他们在这些国王的墓前不停地祈祷和斋戒”^[4]。在英国,扫马受到英王爱德华(Edward I)的召见,并且应国王邀请参加弥撒。

不久,罗马教廷重立新教皇。1288年2月春,扫马抵返罗马,受到新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的接见。新教皇送给他很多礼物,还托他带回致阿鲁浑和马可·亚伯刺罕的信件,信中承认总主教马可·亚伯刺罕对东方所有民族的权力。

扫马返回之后,与马可·亚伯刺罕一直留在伊利汗国,阿鲁浑下令为他建造了一座教堂。列边·扫马身后留有一部记述圣丹尼修道院和圣女小修院的著作。扫马的欧洲之行使罗马教皇坚信:向东方中国正式派遣天主教传教士的机会到来了。

二、天主教士在元代中国

方济各会会士约翰·蒙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是第一位受教皇委派到中国传教的人。1289年,他携带教皇的书信开始东方之行,教皇在书信中写道:“谨致书鞑靼著名君主忽必烈大汗。敬祝今日的洪恩为您带来将来的荣耀。我们感恩上帝、崇高的天主,向他表示虔诚的、充分的谢意,因为他掌握大地诸君主的心灵。我们愉快得知,天主以仁慈的心赐恩于陛下,使陛下有志于扩大基督教的疆域。我们宣教伊始不久,即接见鞑靼名王、高贵的君主阿鲁浑派遣的诚实使者,他们极为坦率地告诉我们,陛下对我们、对罗马教廷、也对拉丁民族和百姓怀有热爱之情。上述使者代表国王诚挚请求我们派数名罗马教士前往贵国宫廷。

当闻如此伟大、如此高尚的一位君主所致令人喜悦和合意之信息时,我们极为感恩天主,真诚祝愿陛下康泰日增,英名荣耀于世,并卑躬恳请施予世人一切美好恩泽的光明之父,以其启示照亮陛下心灵,使陛下更加幸福,同时恳请天主向陛下施撒仁爱之露,使陛下赞美和礼拜其光辉圣名。因此我们衷心希望实现国王的愿望,并渴望陛下乐于应允和热诚接受罗马教会所信仰和崇奉的基督教;因为如无陛下的帮助,派去的任何人都不能做出使至高无上的天主喜悦之事。我们认为理应把我们喜爱之子约翰·蒙特·科维诺(即约翰·蒙高维诺)修士及与其同行的方济各会同事(此信携带者)派遣给陛下,恳求陛下施予仁慈,接待他们(他们所传的教义愿陛下悉心聆听,因此此乃救世之道);还祈求陛下施予圣恩,赞助托付他们的有益工作。这项旨在拯救灵魂的工作,仰仗陛下圣恩庇护,彼等即可更顺利、更有效地进行,我主每以巨大报酬偿付微小之效劳,陛下将因此从吾主获得永世幸福。教皇尼古拉四世即位第二年7月3日(1289年7月13日)写于里埃提。”^{[5](P.192-193)}教皇的书信讨得元朝皇帝的欢心,信中的请求也得到了满足。据说,蒙高维诺到达大都之后,曾劝元世祖忽必烈和元成宗铁木尔信仰天主教,忽必烈没有接受,铁木尔则成为基督的信徒。但也有人对此说表示怀疑。不过,天主教士在中国受到礼遇并且被允许自由传播,这是没有疑问的,而且,每一位会士都由元朝皇帝给予薪俸。

1298年,蒙高维诺在大都城建立第一所天主教堂并且招收信徒。1306年又获准在皇宫大门旁兴建第二座教堂。经过努力,他赢得了相当一批信徒。他曾经成功地使一位景教徒改信天主教,此人便是汪古部的大贵族高唐王阔里吉思。而且,阔里吉思的一部分部民也在这位首领的影响下信奉了天主教。阔里吉思也建造了一座圣堂,取名“罗马堂”,蒙高维诺常在这座圣堂中“按拉丁礼,但以方言和当地文字献祭,祝圣典章和祝圣典章序也不例外”。蒙高维诺在大都的传教活动在他自己的一封信中写得很清楚:“逐渐地,我收养了四十个孩子,年龄自七岁到十一岁,他们的父母都是外教人。他们对宗教一无所知。我给这些孩子付洗,并且按照我们的办法,教他们拉丁文和我们的礼仪。我给他们抄了三十本圣咏,附带歌词,又抄了两本日课。已经有十一个孩子能唱日课经,不论我是否在堂,他们每日唱经,按周轮值,就像(正式)修院

一样。有几个孩子在抄写圣詠和别的必需的经书。皇帝陛下也很喜欢听他们唱。我按时打钟,带着一班小东西唱经,我们没有乐谱,所以要把音调背熟。”到1305年,蒙高维诺已经为6000人施洗^{[1](P.66-67)}。

鉴于蒙高维诺所取得的突出成绩,罗马教皇克勒门五世(Clement V)于1307年委任他为大都总主教,管理东方全境教会,再委派7位主教东来协助他,这7人分别是吉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安德鲁(Andrew of Perugia)、尼古拉斯(Nicholas of Bantra)、安德鲁梯斯(Andrutius of Assisi)、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astordt)和威廉(William of Villeneuve)。他们在旅程中经历艰险,途中有3位死于印度,还有1位做了得利斯特(Trieste)的主教,只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3人于1313年到达大都。

后来,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和德理(Odoric de Pordenone 又译鄂多立克)于1314年启程东来,先到达广州,后北上直到大都,在那里协助蒙高维诺工作3年。回国后写有游记,对他与蒙高维诺在大都的活动有一些描述:“蒙高维诺是大主教,每次当大汗出巡时,他便为之祝福。某一天,当该君主回銮北京时,我的主教、我的小兄弟(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友之间互称“小兄弟”)和我本人,我们前往距该城有两日行程的地方迎接他。我们列队前往晋见高坐在銮辇上的君主,我拿着固定在长柄上的十字架,高唱颂扬圣母的歌曲《慈悲的圣母》。当我们到达御辇附近时,大汗辨认出了我们的声音并让我们向前走到他身旁。由于我们走进他并高举十字架,所以君主免冠并向十字架顶礼。主教为他祝福,大汗非常虔诚地吻了十字架。由于礼仪要求,如果不是向君主送礼,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出现在圣驾面前。根据‘你不能空手见朕’的古法,我向他献上了装满水果的银盘,他非常友好地接受了。我接着便退下了。”^{[4](P.54)}由此可见天主教士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天主教成为为元代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之一。

吉拉德、裴莱格林、安德鲁3位教士来到大都之后,协助总主教蒙高维诺工作了一段时间。1313年,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太太捐款在福建泉州修建了一座教堂,蒙高维诺指派吉拉德前去出任主教。吉拉德去世以后,裴莱格林继任泉州主教,裴莱格林死后由安德鲁接任该职。安德鲁在致故乡人的信中叙述了泉州教区的情况:“滨临大海有一个波

斯语称为Zayton(即泉州)的大城。城中一位有钱的亚美尼亚妇女建有教堂一所,宏伟壮丽。她将此教堂以及相应的财产捐献给主教吉拉德弟兄以及所率僧侣……首居主教之位的吉拉德死后就葬在那里。大主教欲以我继任,但我未同意这项任命。他便与上面提到的主教裴莱格林弟兄商量。裴莱格林得便,乃往其处。在管理该处几年后,他死于我主1322年圣彼得和保罗祭节次周的最后一日。在主教死前大约四年,由于种种理由,我不满足于住在汗八里(即大都,今北京)。我得允许可在泉州领取上述之阿拉法(皇帝所赐之钱财)或曰钦赐。此城如我所说过,离汗八里有三月程之遥。我乘坐一辆皇帝钦赐的用八匹马拉的车,十分荣耀地到达该地,那时裴莱格林弟兄尚在人间。离城四分之一英里处有一片树林,在此我筹建了一座美丽舒适的教堂,楼堂可住二十位弟兄,另有四室,每间都大得足以供一位主教使用。我在此居住着,依靠上述皇帝的恩赐为生。照那位基奴亚(Genoese)商人估计,该恩赐值一百金佛罗林(金币名,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左右。我将此恩赐的大部分用于这所房子。我想,在华美和舒适方面,该省没有一处世袭房产可与我的房子比较。此后,在裴莱格林主教死后不久,我接受了大主教指命,到上述教堂任职。我同意此项任命似乎已有了充分理由。现在,我或居住在住处,或居住在修道院,皆由我自行。”^{[6](P.273)}从这封信看出,元代中国富裕强大,对西方传教士非常优遇。安德鲁之后,伯多禄(Petrus)和雅各布(Jacobus)先后出任泉州主教。

天历元年(1328年),蒙高维诺病死,罗马教廷曾派遣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古拉(Nicholas)继任总主教,但是尼古拉在中途死去,未能达到大都。由于总主教一职长期空位,元顺帝乃于1336年派遣了一个16人的使团西去,请求教皇再派总主教东来。该使团于1338年抵达阿维农,受到教皇的接待。马里诺利(John of Marignolli)等人受派前往中国传教,他们于1342年到达大都。据载:“马利诺里穿着很庄严的祭服,在盛大的仪式中朝觐中国皇帝元顺帝,并且把教皇所赠送的战马和礼物书信献上,颇得皇帝的欢喜。”^{[7](P.49)}马里诺利等人在大都传教3年之后决意西归,元朝皇帝为他们准备了归途所用的财宝和马匹,并嘱咐他们请教皇再派教士来华。后来,教皇先后委派了3人,但是都没有到任。不久,中国爆发农民起义,元朝灭亡,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停止。

三、蒙元统治者对天主教态度转变的原因

从前述事实不难发现,蒙元统治者对待欧洲天主教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前后出现过非常巨大的变化。

入主中原以前,蒙元统治者对天主教采取拒斥的态度,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天主教知之甚少。正如贵由大汗在回复教皇的信中所说:“你来信要我信基督而受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应该受洗。”二是征战时期蒙古贵族的目标是武力征服,而且蒙古大军的西征所向披靡,停战的劝告或游说很难被接受。三是欧洲方面的态度亦较强硬,有居高临下之感,所以贵由大汗才说出“你们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别人”的话来。

入主中原之后,蒙元统治者对天主教却持欢迎态度,原因亦很明显。一是蒙古西征掳回的一些战俘和工匠中有基督教徒,要征服他们的心需要基督教的支持。二是王族成员中出现基督徒,宽容基督教也有助于统治者上层的团结。三是欧洲教皇对元帝的态度亦有变化,从早期的“兴师问罪”到现在的恭维讨好,这在教皇致蒙元统治者的信件中有所反映。1245年,柏朗嘉宾带给蒙古大汗的教皇书信中要求大汗解释西征的原因和意图,并且要大汗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否则“就无法得救”。而1289年蒙高维诺携带的教皇书信则充满了“陛下对我们、对罗马教廷、也对拉丁民族和百姓怀有热爱之情”、“恳请天主向陛下施撒仁爱之露,使陛下赞美和礼拜其光辉圣名”,等等。四是蒙元贵族从打天下过渡到治天下,需要宗教的支持。而元朝统治的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其辖区居民的宗教信仰多种多样,在宗教方面实行兼容政策,有利于元朝统治的稳固。正因为有了这一转变,天主教才得以在元代中国传播发展并产生影响。

元朝时期,罗马天主教派来中国的传教士在北方和南方都有活动,其中在大都和泉州的活动记录保留下来得较多,而事实上,传教士在这两个城市的影响也较大。但是,由于罗马天主教遵行的是上层路线,天主教主要对蒙古人和色目人影响较大,在汉人和南人中影响微弱。

景教和天主教在元代被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信徒被称为“也里可温”。元成宗及其继承人在位期间,都赐予也里可温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而且专门设置了一个主管机构——崇福司,负责掌管也里可温寺院、主教、司铎同修士的祭祀和日常生活等事,元代政府还为罗马天主教教士提供俸禄。而也里可温则为元王朝及其统治者祈福祝寿,双方关系甚为融洽。

四、结语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最初接触缘于蒙古西征,此时,罗马教皇希望蒙古统治者接受天主教,以换取基督教国家的免受征服,而蒙古贵族对此则没有兴趣,不为所动。因此,作为使者的西方天主教士们只能是无功而返。蒙古入主中原以后,罗马教皇希望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而元代皇帝则将天主教视为稳定社会、稳固统治的工具之一。因此出现教皇多次派遣传教士东来的情景,天主教在元代得以传播和发展。蒙元统治者对罗马天主教的态度转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出于有利于统治天下、征服民心的考虑,而这又正好印证了有关文化传播的一个通则——一个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天主教在元代的传播与发展,既与中国信徒的需要有关,更与统治者的需要分不开。

【参考文献】

- [1]王敬义.明前来华的传教士,[M]香港:公教真理学会,1964.
- [2]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3.
- [3]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 [4]沙百里.中国基督教徒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5]阿·克·穆尔.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6]翦伯赞,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何天明)

罗马天主教与蒙元的关系

作者: [左芙蓉](#), [ZUO Fu-rong](#)
 作者单位: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 北京, 海淀区, 100083](#)
 刊名: [内蒙古社会科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7, 28(3)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8条)

1. [王敬义](#) [明前来华的传教士](#) 1964
2.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2003
3. [马承钧](#) [马可波罗行纪](#) 2000
4. [沙百里](#) [中国基督徒史](#) 1998
5. [阿·克·穆尔](#) [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1984
6. [翦伯赞](#)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 1981
7.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 2004
8.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创始人为聂斯托里, 因此又名聂斯托里教. 景教教派的大主教因主张基督具有神和人的双种属性, 被正统排斥为异端, 处以死刑, 他的信徒逃亡东方. 景教于公元6世纪左右传入中国. 景教在唐朝一度兴盛, 后遭迫害, 景教徒开始向西迁徙. 当时西域对宗教信仰很宽容, 随即成为景教传播的中心. 11世纪, 游牧于蒙古北部的蒙古族克烈部皈依了景教, 由于成吉思汗娶了克烈部的一位王女, 景教亦随之传入成吉思汗家中. 此外, 马可波罗曾提到以蒙古东部及满洲部分地区为领地的乃颜部, 其乃颜和不少部属都是景教徒](#)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彭小瑜](#), [PENG Xiao-yu](#) [特惠穷人的取向——天主教社会思想历史考察之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

罗马天主教会历来明确认可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但同时又认为, 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高的社会价值, 私有财产必须从属于人权和人的尊严; 私有财产尽管为个人合法拥有, 却具有重要的社会功用, 天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具有普世的公用性, 所以教会并不认为私有财产是绝对的. 在工业革命以后的现代经济体制中, 严重贫富分化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 特惠穷人的取向成为天主教物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反映出教会力图在尘世实现社会公平的改革纲领. 美国神父富菲(1896-1992年)在一系列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中, 展示了他对天主教社会思想的理解和发展. 本文以他的思想为个案, 对罗马天主教会社会思想进行初步的历史考察.

2. 学位论文 [许璐斌](#) [16-17世纪的远东保教权之争](#) 2009

在16-17世纪的远东殖民史、天主教传教史中, 保教权占据着十分突出的位置, 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罗马教廷为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而国内史学界对于远东天主教史的研究多以某一地区的教会发展史或某一传教士的布道活动为主, 对欧洲诸殖民国家间的远东保教权之争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 鉴于这种不足, 本文详细探讨了16—17世纪远东保教权的内涵、特征以及西方殖民国家对其展开争夺的历史过程, 对远东保教权由葡萄牙一国独有到它同西班牙、法国、教廷四方共有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描述, 并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实质和影响.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勾勒了从15世纪初到1534年间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确立过程. 作者从教皇授予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着手, 论述了远东保教权的葡萄牙化, 并概括了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第二部分分析了保教权对葡萄牙远东殖民利益的实际作用. 作者通过对远东葡系传教士参与的各种世俗活动的分析, 诸如对建立和维系商业关系、提供商业信息、参与殖民地管理、投身商业活动等世俗活动的分析, 探讨了远东保教权的世俗功效, 认为远东保教权巩固和发展了葡萄牙在远东的殖民利益.

第三部分论述了西班牙对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挑战. 该部分分析了西班牙侵犯葡萄牙远东保教权的原因, 详细论述了西班牙教会势力进入远东的经过, 并认为双方的斗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6世纪20-70年代, 该阶段以两国世俗政府间的直接对抗为主, 其特点是国家为传教修会服务; 第二阶段是16世纪70年代后, 以两国各自支持的传教修会间的较量为主, 其特点是修会为各自的保护国谋利.

本文的第四部分探讨了17世纪教廷争夺远东教务领导权. 该部分从分析16世纪中后期以来远东保教权对发展远东教务的阻碍入手, 总结了教廷介入远东宗教权力冲突的原. 因, 论述了教廷自1622年起为收回远东教务领导权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

第五部分讨论了17世纪后期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在远东的活动及其影响. 该部分论述了法国教会势力东扩的原因及法国政府为此所做的各自努力, 认为法系耶稣会士依靠科学知识服务于远东各王室从而扩展了法国在远东的政治、宗教势力, 并指出法国教会势力的东来加剧了各方争夺远东保教权的激烈程度.

第六部分全面探讨了17世纪远东教区的各种权力之争. 该部分紧紧围绕17世纪国家与教廷、修会与教廷、国家与国家、修会与修会间在远东的各种权利之争和矛盾冲突, 着重突出斗争的激烈程度, 凸显了远东保教权的重要性, 并论述了这场争夺对远东教会的历史影响.

综观16—17世纪西方各殖民国家对远东保教权之争, 其对天主教远东教务的影响可谓利弊多寡. 教皇授予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国家远东保教权是希望能借助它们的经济、军事力量发展远东地区的教务, 实现天主教的海外兴盛. 尽管葡萄牙等殖民国家对远东教务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它们始终把世俗利益放在首位. 诸殖民国家争夺远东保教权的实质是为了实现各自的世俗利益, 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这导致了教会利益经常与殖民国家的世俗利益发生矛盾, 而结局往往是教会利益被殖民国家忽视. 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 不仅受殖民国支持的各传教修会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 它们为独占某一地区的教务而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 甚至当时在远东的欧洲传教士已经开始视其世俗使命高于其肩负的宗教使命, 各自的国家利益高于教会利益. 殖民国家和传教修会的这种民族主义排他性做法严重损害了远东教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而17世纪教廷介入远东保教权之争不已

没有平息远东教区内的种种矛盾，实现对远东教务的统一管理，而且还扩大、加深了各方的权力之争。远东教区在经历了16世纪后期的短暂辉煌后，逐渐走向了混乱、衰落。

3. 期刊论文 [徐力源, 曾强. Xu Liyuan, Zeng Qiang 罗马天主教中的传统主义 - 国际资料信息2005, "" \(11\)](#)

1962-1965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以下简称“梵二”)导致罗马天主教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传统主义者指责教廷“变节”和“不公正”,已经向“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投降,并且正在“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对抗常常被媒体描绘成一个旨在挽救“旧弥撒”的怀旧运动。①尽管媒体如此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这一冲突的性质复杂且深刻一既是对“梵二”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挑战,也是对定义天主教性质的权力和权威的挑战。同时,“传统主义”也是一种抗议,抗议天主教迷失自己的认同,丧失了自己在社会、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主导权。

4. 期刊论文 [陈伟. CHEN Wei 施米特的代表理论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 \(4\)](#)

代表理论在施米特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罗马天主教独特性的分析,施米特向人们展示了代表的人格主义、权威性、公共性等内涵。在他的宪法学说中,施米特又与同一性原则相对照,对代表相关问题进行了阐发。施米特的代表理论与他对政治的理解是一致的,他突出对人的关注,彰显政治的特性,表达了一位政治学家、法学家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5. 期刊论文 [彭小瑜. PENG Xiao-yu 基督教道德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以《公益》杂志的战争与和平观为例 -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 \(1\)](#)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美国天主教徒,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平信徒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担任神职的知识分子,秉承了基督教的和平和正义传统,因而能够对现代国际关系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意见往往不被政治家接受和转换为国家政策,但从时段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声音影响了美国的民众,使他们意识到:世俗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应该不是诉诸武力的合法正当的理由。本文的论述主要以美国天主教平信徒创办的《公益》杂志为个案,解释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在20世纪以及晚近时期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考和抉择。

6. 学位论文 [郝国昆 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的变迁 2009](#)

天主教伦理作为人类智慧的总结和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一直保持着与全球人类伦理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道德意识境界,在改造人心、克服全球化所带来的道德危机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

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的变迁一文旨在探寻西方天主教伦理发展的历史及演变的原因、历程,说明这种演变与发展对各个时代及社会产生的影响,提供的精神资源和道德资源和形成的特质,阐释宗教伦理的差异性,各主要宗教在伦理层面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及相互作用,研究天主教伦理的现实发展状况及其现实意义。不仅从宗教的角度,而且从伦理的角度,探寻其对形成人类文化、精神资源的意义作用,以及对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及建构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对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的研究属于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范围,它立足于历史研究,同时需要引进现代哲学理论、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方法,以及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身的论证。希冀通过这样的研究,结合伦理的视角,能够在各种因素的互动中全面反映西方天主教会的风貌。

本文将研究目标定位于西方天主教伦理观,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探讨了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包括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阐释了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伦理观的奠基;首先述析了伟大的贤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然后分析了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伦理观,进而论及罗马时代的西方伦理观,并阐明基督教伦理观是犹太教伦理观的借用和发展。

第三部分探讨了中世纪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伦理的滥觞,内容包括奥古斯丁时代的天主教(基督教)伦理观和奎那那时代的天主教(基督教)伦理观,主要是要阐明在中世纪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伦理观的发展变化和表现活跃的原因。

第四部分着眼于《圣经》伦理的内涵与阐释,重点从《圣经》伦理思想的整体认识、《圣经·旧约》中的伦理观及《圣经·新约》中的伦理观这三个方面对《圣经》伦理进行论证。

第五部分通过对托马斯主义及其他伦理观、新托马斯主义及其内部争论和梵二会议以后的天主教伦理观的解析来说明近代以来西方天主教伦理观变迁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溯源,探究天主教伦理观变迁的历史轨迹和精神特质。

第六部分对西方天主教伦理观的现实地位进行评价,探讨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背景下伦理建设的借鉴意义及对我国在现代视域下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7. 期刊论文 [李瑞虹 罗马天主教与普世教会运动 - 世界宗教文化2008, "" \(2\)](#)

8. 期刊论文 [张书元 罗马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 - 世界宗教文化2007, "" \(1\)](#)

美国是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其高科技产业引领了世界的潮流;与此同时,它也是宗教信仰非常普遍的地方。美国没有国教,然而宗教是美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纽豪斯说:“关于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概念中,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道德”。

9. 学位论文 [王燕荣 西哥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述评 2009](#)

自4世纪初乌斐拉在多瑙河北岸传播阿里乌教派以来,基督教阿里乌教派信仰在哥特人中普遍传播开来。但随着西哥特历史的发展及其罗马化程度不断加深,尤其在定都西班牙托莱多之后,自身的阿里乌教派信仰与当地的西班牙-罗马遗民所信奉的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围绕着宗教冲突而形成的两大对立政治集团,严重威胁着西哥特王国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孕育而生了。本文围绕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展开论述,这次会议之后西哥特正式放弃了阿里乌教派,确立天主教信仰,进而开启了西哥特历史的新局面:将伊比利亚半岛统一在了天主教旗帜下,顺应了当时西欧的历史潮流,而且西哥特在这次宗教会议中所申明的“和子句”信条也迅速传至整个西欧,为之后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埋下了种子。

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三部分:

引言为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对这次会议的决议内容进行分析,主要是围绕宗教教义和教会权力扩大两方面来分析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

正文为第二部分,共四小节。第一小节简要介绍早期哥特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教派及哥特人不断罗马化的过程;第二小节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召开前后展开的政治斗争,进而分析会议召开的必然性;第三小节对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进行概括分析;第四小节主要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历史地位及意义。第三、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

结论为第三部分,总结全文,简要概括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之后西哥特的政治走向、对犹太教徒的迫害,以及如何间接导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等方面。

10. 期刊论文 [刘林海. Liu Linhai 西方史学界宗教改革研究中的新理论探究 -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50\(3\)](#)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宗教改革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转型,在宗教改革的内涵、宗教改革与中世纪传统的关系、激进改革、宗教改革时期的罗马天主教会等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显著的理论突破,丰富和深化了宗教改革领域的研究。

